

野坂参三没有去过华北敌占区 或敌后根据地

孙金科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①一书第74页、75中写道：
“1942年后，冈野进^②秘密潜入敌占区，进行了考察，与日本占领区的有关人士有所接触，并赴有关敌后抗日根据地，检查了各反战团体的工作，于1943年5月回到延安。”野坂参三来华期间去过华北敌占区或敌后根据地吗？王庭岳的说法值得商榷。

关于野坂参三来华后的活动，在报纸、著作中甚少记载。
1943年5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过一则新闻。该条新闻称：

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同志，不久前，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延安的各位同志，都向他致以亲切的问候。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同志特意为他举行了招待宴会……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的会见，这是第一次。延安的各界人士，得知冈野进来到延安，非常高兴，现在，正在准备举行热烈的欢迎大会……冈野进同志将在欢迎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

1944年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考察延安和西北各地的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称：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③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但是物质上还要依靠共产党、八路军的支持。它的领导者冈野进原名野坂参三，是一个著名的日本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家，他在华北经过多年

① 此书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

② 冈野进，是野坂参三1931年到1940年初期间在莫斯科用的化名。1940年3月到1943年5月，野坂参三在中国处于秘密状态，化名改为林哲。1943年5月到1946年1月，他复用冈野进这一化名。1946年1月回国后，野坂参三恢复本来姓名。在此处，用冈野进这一姓名，不十分确切。

③ 此系抗日根据地内日人反战组织，在1944年2月后的名称。

的秘密工作后，最近才到延安。①

除哈里逊·福尔曼的记载外，我没有看到关于野坂参三去过华北敌占区或敌后根据地的材料。如果冈野进去过华北敌占区或华北敌后根据地，他是在到达延安之前去的，还是到达延安后去的？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他的来华过程和到延安后的活动情况。

让我们先考察野坂参三来华的过程。

野坂参三在《回忆延安》一文中自述：

1940年初，莫斯科大地上铺满厚厚的白雪。我每天紧张地准备着。除了我，还有一位印度尼西亚有名的共产主义者，一起行动。

中国同志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秘密通过日本军和国民党军管辖处，到达延安……

终于逐渐接近延安了。我们一行坐上了从国民党方面借来的小型汽车。这时，已是停雪的四月初。②山顶上还留着残雪。由于事先给了通知，我们一行人到时，在各个要地，都有八路军指战员出来欢迎。只是我和印度尼西亚的这两个外国人，是谁也不知道的。有名的年长的林伯渠，特意到途中来迎接我们。

汽车穿过城墙中的大门，进入延安城里……③

再看当时野坂参三的主要助手吉积清的回忆。他说：

1940年5月，在八路军援助下，我和春田组建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本部设在重庆）。

不过，成立反战同盟的想法，不是我们自发产生出来的。京都帝国大学出身的河上肇博士的高材生王学文曾经找过我……我与王先生见面的机会很多，开始我有些惊奇，后来才知道，这时野坂参三已经来到延安。④

① 哈里逊·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熊建华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② 根据和野坂参三一起回国的师哲同志回忆，到延安时间应为3月25日。

③ 《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日本新日本出版社，1967年8月第1版，第233、234页。

④ 《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盟员的记录》，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1963年9月第1版，第80页。

从以上所引资料中可以看出,野坂参三是1940年5月前(确切日期为3月底)直接到延安的。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延安呢?原来,1939年,周恩来因手臂受伤,由邓颖超陪伴,到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1940年初,他的伤初步治愈,即要求回国工作。野坂参三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回祖国领导革命斗争,经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同意,决定与周恩来同行,先到中国,然后回日本。^①这样,他和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以及师哲等一起,于1940年初,秘密离开莫斯科,经新疆、甘肃(没有经日本军占领区),于1940年3月25日,到达延安。^②后因他无法潜回祖国,接受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邀请,暂时留在延安,和中国人民一起,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斗争。^③从野坂参三来华过程看,他与周恩来等同行,取道新疆、甘肃,直接到了延安,可见他在到延安前没有去过华北。哈里逊·福尔曼关于野坂参三在华北经历了多年的秘密工作后才到延安的说法,很可能是源于一些不正确的传闻。

那末,野坂参三到延安之后有没有去过华北呢?野坂参三到延安后,相当长时间处于秘密状态而鲜为人知。虽然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但当八路军政治部有人问及这些文章是谁写的时,《解放日报》社都回答:“是王学文写的。”^④这说明,1943年以前延安党政领导机关内许多人并不知野坂已到延安。或许由于这个缘故,关于野坂这段时间去华北的传闻容易使人相信。

但1942年后,野坂参三是否离开过延安,到华北敌占区或其它抗日根据地去活动过,而于1943年5月返回延安呢?

前引王庭岳书中所述“1942年后……”,是否包括1942年?并不明确。我们姑且当作包括1942年在内来分析。

①③④ 《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第232页;238、239页;240页。

② 赵安博:《抗战时期的敌军工作琐记》,载《人民政协报》,1991年6月7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载《光明日报》,1991年12月26日。

1942年6月23日，在延安宝塔山下的日本工农学校，召开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野坂参三参加了这个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1942年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了社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这篇文章后被收入《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显而易见它是出自野坂手笔。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议长大山光义，在战后回忆文章《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中说：

1942年8月15日至18日，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8月27日到28日，在日本工农学校，非常隆重地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七天时间……冈野进同志和原清志同志（女）也参加了会议。^①

1943年4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时事评论文章：《日本政界的纠纷和日本今后的动向》。这篇文章是野坂参三写的。他写完后即交八路军敌工部部长王学文，王学文于当天送到《解放日报》社。几天后，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陕甘宁边区从1942年底，开始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使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的饭菜丰盛起来。据学员回忆：

不久，我们强烈要求，不能心安理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热心照顾，我们应该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生产劳动，以便减轻一点儿边区人民的负担。我们向冈野校长提出了这个意见。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可以参加生产’……1943年秋，我们收获一万斤土豆，九百斤大豆和玉米。我们炊事员收购冈野校长在繁忙之余生产的土豆，也是在这个时候。^②

以上情况表明，野坂参三在1942—1943年间，一直在延安工作，从未离开延安到过其它地方。

1984年，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领导人吉积清，在给笔者回信中指出：“野坂参三到中国后，一直住在延安，指导抗日根据地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86年，在北京

①② 见《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员的记录》，第94页，第137、138页。

丰台区举行北京市中日关系史讨论会时，当年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向笔者说：“野坂到延安，直到回国，没有离开过延安。”1992年2月10日，他又在给笔者信中说：“野坂自1940年来延安后，直到1945年年底回国，一直在延安生活和工作的八路军敌军工作部副部长李初梨，1992年2月6日给笔者信中也说：“冈野进在中国期间从来没有离开过延安。”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到：1942—1943年，野坂参三一直在延安工作。这段时间，他没离开延安去过日本占领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

王庭岳的有关说法，是对1943年5月31日《解放日报》的消息缺乏推敲。“不久前，冈野进来到延安”，这里的“不久前”，可以作各种不同的理解，而王庭岳只把它理解为前30天以内，这就离开实际了。另外，也许由于他不加分析地看重了哈里逊·福尔曼著作中有关的不正确叙述，把上述两者随意搅到一起，加以发挥，于是作出了不确切的论断。

根据对前述资料的分析，关于野坂参三在中国的时间、地点情况大致是：他1940年3月下旬到达延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一直住在延安，从事革命工作。若他曾离开过延安，在他和他助手们的回忆文章中，必会有反映。但直到今天，从未看到这种反映。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在离开延安赴重庆前夕，为野坂参三举行了欢送宴会。9月初，野坂参三搭乘美国运输机，从延安到达张家口。接着，换乘苏联飞机到达长春，在长春住了一个月左右后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住了约一个月后又回到沈阳；不久，经过朝鲜，在釜山乘遣返船，于1946年1月12日，在九州博多湾登陆，回到他离别13年的祖国。

（作者单位：江苏省赣榆县政协）